



文史哲博士文丛

◎ 张晓曼 著

《四声通解》 研究

齊魯書社

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
出版基金资助
韩国研究丛书

◎ 张晓曼 著

《四声通解》 研究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声通解》研究/张晓曼著. — 济南: 齐鲁书社,
2005.8

(文史哲博士文丛)

ISBN 7-5333-1544-8

I. 四… II. 张… III. 汉语—音韵学—研究
IV. H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4796 号

《四声通解》研究

张晓曼 著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E-mail: qlss@sdpress.com.cn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875 印张 2 插页 160 千字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3-1544-8

H·50 定价: 18.00 元



张晓曼 黑龙江省黑河人, 1967年生, 山东大学韩国学院对外汉语系副教授。1989年7月获得东北师范大学文学学士学位; 1999年7月获得山东大学文学硕士学位; 2001年3月至2004年2月在韩国釜山大学人文大学院比较语言学专业学习, 获得文学博士学位; 2004年12月至今在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现为汉语方言学会会员、韩国中语中文学会会员。主要从事现代汉语、音韵学、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工作。先后在《方言》、《山东社会科学》以及韩国学术杂志《中语中文学》等刊物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同时为省、部级两项科研项目的负责人。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一、关于《四声通解》研究的一般概述.....	1
二、研究的动机和目的.....	2
三、研究的内容和范围.....	6
四、研究的方法.....	6
第二章 中韩两国关系的历史渊源	9
一、中韩两国在历史上的交往.....	9
二、语言文化等方面的交流	11
三、朝鲜时期的语言政策和《训民正音》的创制	16
第三章 崔世珍和《四声通解》的编纂	27
一、语言学家崔世珍	27
二、《四声通解》的编纂.....	30
三、关于《四声通解》声韵系统的一般叙述	33
第四章 《四声通解》的声母系统	46
一、全浊声母有所反映	47
二、“知、照”系声母的合并及其音值.....	55
三、“疑”母、“影”母与“喻”母的合流	64
四、唇音的分化以及“非奉微”母的变化	67
五、“日”母的音值.....	73

六、小结	75
第五章 《四声通解》的韵母系统	78
一、阴声韵	82
二、入声韵	97
三、阳声韵	108
四、小结	130
第六章 《四声通解》的声调系统	134
一、《四声通解》的声调	134
二、连读变调	162
三、《动静字音》研究	166
第七章 《四声通解》与中国韵书之关系	179
一、韵书的传承关系	179
二、《四声通解》与《广韵》	181
三、《四声通解》与《集韵》	185
四、《四声通解》与《蒙古韵略》	187
五、《四声通解》与《古今韵会举要》	190
六、《四声通解》与《中原音韵》	192
七、《四声通解》与《洪武正韵》	196
第八章 结论	201
主要参考文献	209
后记	215

第一章 绪 论

一、关于《四声通解》研究的一般概述

《四声通解》是韩国朝鲜时代著名语言学家崔世珍历时四年编纂而成的一部汉语言韵学著作，作于1514年，成于1517年。该书用韩国的训民正音对16世纪初期的中国语音进行了记录。中国以往的韵书常常是为了科举考试、作诗赋词押韵而作，而《四声通解》则是为朝鲜时期的人们学习汉语而作。关于写作的目的，在《四声通解·序》里可以看到：“夫始肄华语者，先读《老乞大》、《朴通事》二书，以为学语之阶梯。初学二书者，必观《四声通考》，以识汉音之正俗……今将《通考》一书，亦已转闻于朝，证据古韵，抄著音解，焚膏继晷，誊稿七易，迄今四载，方克就绪，厘之为上下二卷，名之曰《四声通解》，庶令新学便于检阅，音释源委，开卷了然，一字数音，不至误用矣。”在今天看来，《四声通解》相当于当时学习汉语的字典。

关于《四声通解》的研究，在韩国，比较系统地进行研究的著作和论文有姜信沆的《四声通解研究》和李在敦于1993年发表在《中国文学》上的《四声通解里反映的十六世纪中国语音界研究》，以及最近出版的이강로의《四声通解研究》，其

他的是一些介绍性的短文和对其相关部分的研究。但是这些学者往往是从韩国语文学的角度出发进行的研究,有的人甚至对汉语不甚了解。中国学者关于《四声通解》的研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比较系统的研究。由于中韩建交的时间比较短,两国学者的交往合作还不是十分频繁,并且有的人碍于对韩国语的掌握程度,所以他们使用的资料往往是间接的,进行的研究常常是部分性的。曾经在这方面做过研究的学者有胡明扬、梅祖麟、蒋绍愚、李得春、李钟九、孙建元、尉迟治平等。此外,日本学者远藤光晓等也进行过这方面的研究。

《四声通解》是对中国近代汉语语音、词汇的记录。近代汉语是一门语言历史学科。关于近代汉语上下年限的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研究中未曾见过专门的讨论,只有瑞典汉学家高本汉、中国学者王力、吕叔湘等在讨论整个汉语史分期时曾涉及此问题。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胡明扬、杨耐思、袁宾、蒋冀骋、杨建国、蒋绍愚、刘坚等学者曾对此问题进行过专门讨论。蒋绍愚先生在《近代汉语研究概况》中曾就近代汉语的分期问题下过专门定义:“近代汉语是从唐初到清初人们在口语和反映口语的书面语中使用的汉语。”^①可见在近代汉语中口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二、研究的动机和目的

笔者2000年2月到韩国做交换教授,在学习韩文的过程中,感觉到韩国语词汇与汉语词汇在发音上有很多相似的,于

^① 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是对韩文和汉语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兴趣。尤其是进入釜山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课程以后，师从康寔镇老师，学习了“朝鲜韵书研究”这门课程，对朝鲜时期申叔舟、崔世珍等语言学者有所了解，并对他们的成就十分惊叹，同时更对崔世珍的《翻译老乞大》、《翻译朴通事》、《四声通解》等书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通过学习，发现它们对近代汉语的研究具有非常大的价值，于是下决心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以分析清楚汉语和韩语之间在历史上的渊源，并进行近代汉语语音方面的研究。

1. 对近代汉语语音的研究具有很大的价值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对于汉语语音的记录一般采用直音法、反切法等。直音法是“某，读某”，反切法是用两个汉字注出另一个汉字的读音，用反切上字代表另外一个汉字的声母，用反切下字代表另外一个汉字的韵母和声调。《四声通解》用韩文来标注汉语语音，由于韩文是表音文字，所以和我们今天的汉语拼音一样，其读音可以一目了然。崔世珍在写作《四声通解》这部韵书时，一方面参照了《洪武正韵译训》，注重对读书音的记录，另一方面他还十分注重对当时语音的记录，从这点看，这部韵书对于我们了解明代初期汉语的实际语音是一部十分有价值的韵书。书中对于卷舌音状况的描述，对 -m、-n 韵尾的合并，对入声的演变，对上上连读变调的记录等等，对于我们今天的研究实在是非常有价值的资料。它的价值就在于它对上述各项的详细描述，用表音文字记音，描写时间明确，记音地点明确。

2. 对于了解近代汉语语音的演变非常有意义

明代官修韵书《洪武正韵》成书于 1375 年，申叔舟的《四声通考》成书于 1454 年，崔世珍的《四声通解》成书于 1517 年，通过这三部书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到这一时期汉语语音的演变情况。比如，入声的发展变化是这样的：《洪武正韵》时期，入声韵尾是分立的，分别为 -p、-t、-k，到了《四声通考》时代，三个入声韵尾混而一之，成为喉塞尾 -ʔ，到了《四声通解》时代，喉塞尾 -ʔ 也消失了，成了开尾韵。但是根据笔者的考察，这时入声字只有一小部分混入到其他声调里去，大部分还是分立的，正如今天的长沙话，虽然入声韵尾消失了，但是它们的声调还是有别于平上去三声而独立存在的。如果说《洪武正韵》是南音体系，那么我们姑且抛开它不去讨论，只看看从《四声通考》到《四声通解》，即从 1454 年到 1517 年，在这短暂的时间里，语音就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而在《四声通解》这部韵书中都完整地记录了下来。所以这部韵书实在是一部不同寻常的韵书。

3. 对于我们梳理清楚中韩语音之间的关系很有意义

15 世纪中叶，朝鲜世宗大王（1419～1450 年在位）为了改变文字与国家语言不统一的现象，与集贤殿的学者们一起深入研究韩国语音和汉语音韵，以制定能书写韩国语的文字方案。为了充分地吸收中国汉语音韵学的成果和准确地标写汉语读音，世宗大王曾派遣成三问等人十三次到中国辽东，向居住在那里的明朝翰林学士黄赞求教音韵学。1443 年，他们创造出韩国文字。韩国文字最初被世宗大王称为《训民正音》，它

是一种字母文字。尽管它不同于表意文字的汉字，但在语音以及造字结构上仍然受汉字的影响。其中，初声相当于汉语音节中的声母，中声相当于汉语音节中的韵头、韵腹和元音韵尾部分，终声相当于汉语音节中的辅音韵尾。由于它是由子音和母音以或纵或横的方式组合而成的音位文字，所以它的字形仍然像汉字一样具有方块字的特点。可见，《训民正音》的创制是韩中文化交流的结晶。

4. 对于我们研究与中国其他韵书的关系非常有意义

韵书总是代代相传的。后世韵书有的是在前代韵书的基础上编撰而成，或者是增修，或者是简缩，或者是重编。《四声通解·凡例》里曾经提到，此韵书在编纂的过程中参照了《广韵》、《集韵》、《蒙古韵略》、《古今韵会举要》、《中原音韵》、《洪武正韵》等韵书。这对于我们研究这些韵书之间的关系，剥离开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有着很重大的意义。

过去一直认为明代的官话是以北京话为基础的。^① 因为元代建都大都，明代建都北京，首都使用的方言，自然是当时官话的基础方言。但是，近年有人提出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是南京话，如日本学者远藤光晓就曾提出过这一观点。远藤光晓是从《翻译老乞大朴通事》入声的特殊性质而推想到南京话可能是当时的标准音的。鲁国尧也认为，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未必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南京话在明代占据一个颇为重要的地位，或许即为官话的基础方言，他是从《利玛窦中国札记》人

① “官话”一词在元代似乎尚未出现，明代张位《问奇集》曾云：“江南多患齿音不清，然此亦官话中乡音耳。”

手进行研究的。^① 在这方面，我们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三、研究的内容和范围

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四声通解·序》。(2)韵母定局，分为二十三大韵，八十韵母。(3)广韵三十六字母之图。(4)韵会三十五字母之图。(5)洪武韵三十一字母之图。(6)凡例，共二十六条。(7)《四声通解》正文，分为上、下两部分，以二十三大韵为顺序，每一韵里以三十一声母为顺序，每一声母下又以平上去入四声为顺序编排。(8)《四声通考·凡例》十条。(9)《翻译老乞大朴通事·凡例》九条。(10)《动静字音》。

以上述内容为契机，来展现明代初期的语音面貌。研究内容包括中韩两国历史上的渊源关系、朝鲜时期训民正音的创制情况、语言学家崔世珍的功绩、声母的研究、韵母的研究、声调的研究，以及《四声通解》与中国韵书的关系等。从共时的角度对明代初期的语音面貌进行全面拟测，从历时的角度对近代汉语语音的演变进行分析。

四、研究的方法

崔世珍所著的《四声通解》采用的是同注异法。书中收录了汉语的四种语音：一是正音，即《洪武正韵》反切所代表的

^① 鲁国尧《明代官话及其基础方言问题》，见《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

音系；二是蒙音，即元代《蒙古韵略》所代表的汉语音系；三是俗音，即崔氏的前辈学者申叔舟等记录的、收在《四声通考》中的1454年前后中国北京的汉语实际语音；四是今俗音，是崔世珍自己在1514~1517年写作《四声通解》时所记录的汉语实际语音，也就是当时的官话标准音。这四种都是用训民正音译写标注的，方法就是同注异法。他的具体做法是先根据《洪武正韵》音系设置全书的总体结构体系，声母、韵母用训民正音标注，然后把这四种音对号入座，安排到各个框架里面，凡是跟正音同音的一律不注，不同音的一律加注，这样就会在一个语音框架里同时安排好几个音系。

笔者在研究《四声通解》时，首先剥离开各个音系，对《洪武正韵》所代表的正音加以研究，同时兼顾到俗音和今俗音，尤其重视对今俗音的研究，因为它代表了16世纪初期北京的实际语音系统，这样构拟出的语音系统才能代表当时活的语音体系，能够恰当地反映当时活的语音现象。

其次，还采用了对音比较拟测的研究方法。利用不同历史时期的汉语与非汉语的双向音译材料推求当时汉语音值的方法是对音比较拟测法，主要材料有梵汉对音、于（阩）汉对音、吐（火罗）汉对音、回（鹘）汉对音、藏汉对音、契（丹）汉对音、（西）夏汉对音、波（斯）汉对音、蒙汉对音、朝汉对音、满汉对音；域外译音有日本译音、高丽译音与安南译音。高本汉所说的对音仅限于梵汉对音，后来中国学者把高本汉的日译汉音、日译吴音、高丽译音、安南译音等境外译音都作为对音。对音是指两种语言相互翻译时所形成的译音。对于语音研究者来说，对音是相当重要的材料。利用不同历史时期的对音资料，推求当时的汉语音韵面貌，考订语音系统的方法就称

为对音比较法。^① 运用这种方法来考订音系，因译音时代明确、标音清楚，所以对说明汉语音系特点及其音值，都有莫大的助益。因此，向来极受研究者的重视。

再次，采用了列表比较法。如，在进行韵母研究时，首先列出《广韵》韵母表，在此基础上把《四声通解》韵母的归属列于其右，比较观察其演变情况。

此外，还采用了历史性资料的分析方法，以及历史语言学、共时、历时的分析方法。

^①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

第二章 中韩两国关系的历史渊源

一、中韩两国在历史上的交往

中韩两国历来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人们常用“唇齿相依”来形容两国的这种关系。这种悠久的历史关系，是维系两国三千年来不断交流的纽带。

传说洪荒日，檀君降树边。位临东国土，时在帝尧天。

传世不知几，历年曾过千。后来箕子代，同是号朝鲜。

这首诗是朝鲜使节权近（1352～1409年）于1396年访问明朝时，为回答明太祖询问朝鲜开国历史时所作。^①所谓檀君，是历史传说中的古朝鲜开国元勋，“号称檀君王俭”、“始称朝鲜”。关于檀君建国的神话传说反映了韩国古代社会从图腾崇拜的部落形成成为国家的过程。后来，箕子建国，^②檀君朝鲜灭亡。箕子是中国殷朝末年的三贤之一。据文献记载，箕子是殷朝纣王的叔父，名胥余，曾被封为子爵，国在箕，故称箕子。“周武王即位己卯，封箕子于朝鲜，檀君乃移于藏唐

① 陈尚胜《中韩交流三十年》，中华书局1997年版。

② [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王朝实录》。

京”。^①

汉武帝时期曾在朝鲜设置了乐浪、临屯、真番、玄菟四郡，史称“汉四郡”。汉四郡的设置，在客观上促进了汉朝腹地与朝鲜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从考古发掘出的文物看，汉文化已通过乐浪郡传播到朝鲜南端的金海、永川、扶余和济州道等地。移民是当时中韩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

唐朝时期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和对新罗的特殊友好政策，与新罗的关系十分密切。唐朝政府将新罗视为“君子之国”，总是尽可能地满足新罗王朝在文化上的各种需求。而新罗王朝在外交上频频派遣使团到唐朝访问，在文化上派遣留学生到唐朝学习。唐朝诗人张乔在《送人及第归海东》诗中，高度概括了新罗留学生频繁往来于唐朝的情况：“东风日边起，草木一时春。自笑中华路，年年送远人。”诗题中的“海东”，是唐朝人对新罗国的一种称呼。不仅如此，两国民间往来也比较频繁，根据日本僧人圆仁的记载，^②在唐朝的黄海沿岸地区曾经存在着一些新罗人的侨民社区，当时被人们分别称为“新罗村”、“新罗坊”。两国的民间往来促进了两国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明朝时期，中韩两国的友好关系更加巩固。1392年8月17日，李成桂即位，将国号改为“朝鲜”，从此建立起朝鲜朝的统治。朝鲜朝建立之初，立即派使团到明朝建交，希望能得到明朝的承认。明太祖也尊重朝鲜的独立并希望双方和平友好相处。从此，明朝与朝鲜之间的友好

① 《三国史记》，[韩国]大提阁 1987 年版；《三国遗事》，[韩国]大提阁 1987 年版。

② 圆仁曾在 839~847 年旅唐求法，著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关系建立起来。两朝的外交使节往来十分频繁，每年都有数次之多。而且两国大多派文臣往来交际，这样既增进了两国的政治关系和儒臣间的融洽之情，又促进了两国间的文化交流。这期间，李朝从明朝引进了大量中国典籍，并大量刊行中国书籍。李朝世宗大王为了改变国家语言与文字不相统一的问题，召集群臣致力于对中国韵书的研究，并创制出《训民正音》，之后又发动学者对中国古书进行谚解工作。这些都促进了中国儒学在韩国社会的深入传播。16世纪末期，朝鲜朝面临日本丰臣秀吉的灭国之灾时，明朝政府立即派遣大军援助李朝，共同抗敌，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这在历史上称为“壬辰倭乱”。通过这场战争，朝鲜的有识之士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韩两国人民友谊的深厚和明李两国政府关系的亲密，朝鲜诗人许筠在送别参加援朝的明朝友人时所作的诗，对这种友好关系进行了高度概括：“国有中外殊，人无夷夏别。落地皆兄弟，何必分楚越。肝胆每相照，冰壶映寒月。”^①

二、语言文化等方面的交流

汉语是世界上古老的语言之一。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是汉字。一般认为，早在商代晚期就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文字体系，这就是甲骨文。此后的一段时期，中国人民凭借这种古老的文字记录了自己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同时，它还作为传播文化的书写符号，远播到韩国、日本和越南等地，直到今天，这些国家还在使用这一古老的汉字。今天看来，汉语和韩

^① 许筠《许筠文集》，[韩国]大同文化研究院。